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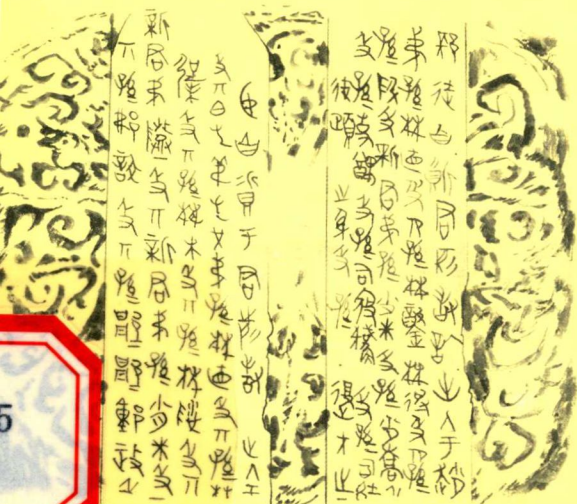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四辑)

总主编/李玉明

侯马盟书研究

降大任
/ 著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文物。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韩 慤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4辑)

侯马盟书研究

降大任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56-8
G·23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玗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侯马盟书发现的概况	(1)
二、何谓盟书	(3)
三、主盟人赵鞅其人	(5)
四、张颌先生的盟书研究	(13)
五、盟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4)
六、张颌的盟书研究特色	(29)
七、余话	(32)

副 主 编 李元庆
主 编 董永刚

引 子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侯马盟书发现的概况

侯马盟书是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于1965~1966年发掘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即晋都新田，考证见后文）时发现的。这个遗址包括有古城、墓葬、铸铜、陶范等，后又发现有春秋末晋国的一处盟誓地址。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盟誓遗址分甲、乙两区，甲区集中于遗址的西北部，盟书即出土于此，一称“埋书区”；乙区面积大，较分散，多埋牛、羊等牲畜，未见盟书，称为“埋牲区”。经过科学勘验，可以对古代盟誓时实行的“坎牲加书”礼制有较为直观的了解。埋盟书的坎，大小、深浅不一。多数坎的北壁底部都有一小形壁龛，内放玉器（即币）。从出土的迹象判断，所谓“坎牲加书”，就是掩埋时先在壁龛内放玉币，然后放入牺牲并加盟书。正如《周礼·秋官·司盟》郑注讲的“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盟书一

式两份，一份“藏在周府”，可查验。一份埋入地下，或“载书在河”。

侯马盟书属于埋在地下的那一部分。这次出土的盟书数量很大，有5千多件，有文字可辨识的约650多件，与盟书一起出土的还有玉器、丝织物、陶器残片等遗物。通过对陶器残片的科学测定，可推断盟书产生于春秋晚期，与盟辞内容相比照，可了解主盟人活动的年代和有关史事。另据知，200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在侯马市新田东路南侧，再次发掘祭祀坑114座，埋有牛、马、羊、牺牲、玉璧、玉龙，并发现可能是“血祭”的空坑。该遗址西距侯马盟誓遗址约800米，北距“排葬坑”墓地百余米，西北约1000米为呈王路庙寝建筑群遗址。这个祭祀遗址是历年来唯一彻底揭露的祭祀遗址。至此，整个侯马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和埋藏规律已基本探明。

盟书的盟辞写在圭形或璜形的玉石片上，字迹多为朱红色，少数为黑墨色，圭形石片最大的长达32厘米，宽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长为18厘米，宽不到2厘米，厚仅0.2厘米，还有的薄如纸片。余有不规则块状和片状者，大不过拳掌。

盟辞内容不同，篇幅长短不一，字数最少的仅十余字，长的多达220余字，一般在30~50字到百余字之间。盟辞初见时，研究者称为“朱书文字”。《文物》1966年第2期发表郭沫若先生研究文章认为这是战国初期的盟书文辞，学术界均认同为“盟书”。不过，侯马盟书并非首例发现。类似的文物，于1930~1942年曾在河南三次出土墨书的“沁阳盟

书”，只是当时不称盟书，而称石墨。由于沁阳盟书存世太少，且有散佚，未引起更多的研究者注意。故而，真正的盟书研究是从侯马盟书发现后开始的。从张颌先生在1966年《文物》第2期上发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起，郭沫若等众多学者相继进行研究，发表论文，从而逐步揭示出它的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使这项研究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何谓盟书

如前所述，盟书亦称载书，是参盟者彼此取信的一种文献。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卿大夫之间常常为维护共同利益举行盟誓活动，称“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可见誓与盟有区别。与盟有密切关系的还有诅。誓、盟、诅三者性质相近，功能有异。

关于誓，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尚书》中的《汤誓》《牧誓》两篇誓辞，可证殷商时就有誓。今之发誓、起誓、誓言等由此而来。誓言是起誓者忠于某一人事的诚信表白，如《国语·晋语》中晋文公对其舅子犯发誓：“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又如春秋末铁之战时赵鞅动员将士之誓：“克敌者”云云。

盟则较誓更为郑重，即在起誓时有“莅牲”，即杀牲祭祀，昭告神明，有一定的仪程，如前引《周礼·秋官·司盟》之盟载法。文献誓盟连言，为统称，强调二者共有的诚信自

约意义,只是盟必有誓,誓未必有盟。后世如汉初刘邦与诸将“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是有盟有誓,既有仪程,又有誓言。

诅即诅咒,当源于原始巫术,文献或称诅祝,有时与盟连言为诅盟。《尚书·吕刑》云:“罔中于信,以覆诅盟。”是说互相不信任,就会受诅盟的惩罚。《诗·何人斯》注:“民不相信,则盟诅之。”是说人们互不信任时,就应以盟诅的方式达到彼此诚信。疏:“诅是盟之细,故连言之也。”是说“诅”是在细节问题上的一种盟誓,诅与盟有同样的性质,但二者又有区别,在《周礼·诅祝》中载有8种祝号,盟为第一种,诅为第二种。注:“大事曰盟,小事曰诅。”疏:“盟者盟将来,春秋诸侯会,有盟无诅;诅者诅往过,不因会而为之。”意谓重大事件可举盟,一般事件可用诅。盟是集体性的,诅则可以个人行为。盟是表示既盟之后不许干什么的誓约,而诅则是对已发生的罪过的谴责和诅咒。在侯马盟书中发现,既有朱书的盟辞,又有墨书的诅辞,可见二者既有密切关系,而又有所不同。考古发现有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07年)的《诅楚文》是一篇著名的诅辞,但辞中有“诅盟”一词,可见诅与盟可以相互借用,古人对之不严加区分。

此外,还有一种蛊,往往与诅相连系。《汉书·外戚传》有“巫蛊祠祭祝诅”之句,古人对蛊有多种解释,不列举,要之是对敌人加害的迷信手段,侯马盟书墨书中出现有蛊字,说明蛊与诅是并用的精神武器。

侯马盟书包含有誓、盟、诅、蛊等意义,可以从多方面研究。这里主要对盟书有关事例略作解说。先秦史籍涉及举

盟的例子很多,就参盟者的成分来分析,大抵有天子与诸侯间、诸侯相互间、诸侯与卿大夫国人间、卿大夫之间这四种举盟的情况。

以上参见《考古》1980年第1期王宇信文。

从侯马盟书内容来看,它属于卿大夫之间的盟誓。

据统计,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22~公元前468年)的254年中,诸侯之盟有约200次之多,其中涉及晋国的有50余次,至于私家宗室之盟更是不胜枚举。足见,盟誓类活动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何等频繁和重要,由此亦可知,研究侯马盟书对了解春秋末期的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主盟人赵鞅其人

具体而言,侯马盟书是在怎么特定历史背景中产生的,这就要通过参证盟书的文字内容与有关历史材料相印证加以辨识与判断。

经考证,可以得知侯马盟书的主盟人是春秋末晋国的正卿(执政者)赵鞅(即赵孟、赵简子,具体考证见后文)。史籍所载,赵鞅活动的春秋末期,是中国先秦时期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其时,不仅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徒拥虚位,而且各诸侯国的公室亦日形衰落,各国卿大夫争权斗争激烈,陪臣执国命现象所在多有。这在曾为五霸之一的晋国尤为典型。侯马盟书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赵鞅参与晋国

内部由六卿内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争，正是这场政争拉开了作为标志战国时代开端的“三家分晋”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春秋末期，晋公室之衰微迹象在晋平公时十分明显，《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晋平公十九年）载晋国政治家叔向与齐国名相晏婴一次宴会间的谈话，叔向称晋平公时公室已属末世，军队败坏，军制紊乱，无人统帅管理，已失掉了战斗力，国人百姓不堪重负，而国内仍大兴土木，修筑宫室；饿死的人不绝于道路，而公室荒淫日甚，奢侈腐化。百姓听到公室的政令，像逃避寇匪和仇人一样。栾氏等八大家族地位下降如同奴隶，政出私门，民众无所依归，四处流亡，而国君不思悔改，自得其乐。公室的衰落已没有多少日子，公族的枝叶先落，公室也将随之垮台了。《史记·晋世家》亦载叔向之语云：“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叔向的话得到晏婴的认同，晏婴预感“齐之政后卒归田氏。”叔向则预感：“晋之政将归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晋国“六卿强，公室卑”，在3年后（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被不幸而言中。20年后，周天子（敬王）以王子朝之乱逃奔于晋国，由晋定公支持下才回到国都成周。《史记》载，公元前516年（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这里所言六卿即赵氏、魏氏、韩氏、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祁氏、羊舌氏相互交恶，被六卿杀掉了，六卿还瓜分

了他们的采邑，分为十个县，派自己子弟去作大夫，当管理者。

六卿中赵氏是颇具实力的一支势力，其后来的宗主即赵鞅（赵孟、赵简子），赵鞅还是晋国的正卿（执政者），也就是后来侯马盟书上所书写的盟主。赵鞅是一位颇有雄心和手腕的人物，在六卿中很快便崭露头角。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是说赵、荀两个铸了一个大铁鼎，在鼎上又刻铸了刑书。这个刑书当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的成文法。孔子听说此事感到这是晋国濒于败亡的征兆，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认为，晋国的政局破坏了传统规范，让百姓懂得了刑法，贵贱等级混淆，国家就难以维持统治，不像个国家了。

赵鞅的政治作为除了铸刑鼎外，还曾作为晋卿为晋定公相参与同吴王夫差的“黄池之会”，但他的主要活动还是国内。赵鞅其人富有政治经验，黄池之会后，他曾向郑国贤臣子大叔（游吉）请教“揖让周旋之礼”，懂得“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的原则。游吉死后，他表示要遵守游吉所言“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的箴言，即不要作乱，不要以富压人，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违背大家的共识，不要骄慢无礼，不要骄傲自大，不要反复发怒，不要干无道德的事，不要犯不正义的过失；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认为这样就会获

得当时卿大夫的拥戴。但赵鞅并非固守礼制约束的谦谦君子，他还了解适应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看风使舵，使用诈计的重要性。对不利于自身专权的坚决排除，如他为了“天下可图”，杀掉贤人蒯大夫，使孔子知之临河而返。可见其人精于权谋，政治上大有野心。当得知鲁国国君被强族季氏逐出国门七年之久而客死他乡的事件后，他请教晋国史官史墨（史黯）鲁君客死的原因，史墨向他讲述过“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道理，这对他从政采取适时而动，随机应变策略以保存发展赵氏实力，便有很大的启示。

赵鞅为了巩固赵氏实力，一项重大决策是任用家臣董安于和尹铎修筑晋阳城，使之成为赵氏坚强的军事保障和大本营。晋阳城的营建成为后来联络韩、魏灭掉智氏终于三家分晋的可靠依托。这充分显示了赵鞅的长远战略眼光。其次是赵鞅实行以240步为亩的田亩制。银雀山汉简《吴问》载赵鞅实行的田亩制，较之范氏与中行氏实行的160步为亩、韩氏实行的200步为亩的亩制均要大许多，这就改变了以往“籍而不税”的旧税制，且亩大而税轻，减轻民众负担，使“利归于民”，也就赢得了民心。其三是赵鞅尊贤爱士。《国语·晋语九》载他曾向晋大夫壮驰兹询问东方贤士为谁，又唯才是举，《左传》和《韩非子》中都提到他任用鲁国季氏之叛臣阳货，使其“善事简主，兴主之强。”他任用手下的少室周、牛谈及士人周舍，皆为干才，而对“长吾过而绌善”的奸佞之徒鸢缴则沉之于河严惩之。对敢于对他批评进谏的烛之过、史墨，赵鞅尤表礼敬，采纳其言；贤士阳城胥渠得

了重病，赵鞅杀其所爱之白骡取肝而疗之，使之感激而奋勇杀敌。正是由于赵鞅有着素识机变的政治素质，故而在六卿内争中赵氏能由弱转强，不断壮大。

赵鞅经营晋阳后遇到的第一次内争发生在赵氏宗族内部。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鞅讨伐卫国，获得卫国进贡的500家，安置在邯郸。3年后(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鞅要求邯郸赵午交出这500家，移置于晋阳。邯郸赵氏的父兄认为赵鞅的要求有损于同卫国的交往，不如攻齐国，待齐国报复时乘便迁此500家，尚有理由维持与卫国的和好。赵鞅知道后，大怒，“召午而囚诸晋阳”，并告知邯郸赵氏：“赵午有罪，你们另立一个主子吧。”接着便杀了赵午。这当然激怒了邯郸赵氏，赵午之子赵稷及家臣涉宾立即发动了叛乱。赵鞅即派遣上军司马籍秦率军包围了邯郸。

赵氏发生内哄，范氏、中行氏因与邯郸赵有亲姻关系(赵午乃中行寅即荀寅之甥，范吉射又与荀寅为姻亲)，不愿出兵助兵围邯郸，反而图谋反对赵鞅。赵鞅的家臣董安于提醒应有防备，赵鞅说“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按，当是从先前游吉所教“无始乱”之言)是年秋，范氏、中行氏果然联兵攻伐赵鞅在绛都的宫室，赵鞅抵挡不住，遂逃奔晋阳。事实上，赵氏内乱是赵鞅最先发难(杀赵午)，未奉晋定公之命而行，故《春秋》书：“赵鞅以晋阳叛。”就是说赵鞅违背了君命，在晋阳搞叛乱。

此时智氏、韩氏、魏氏均打算在赵氏内哄中削弱范氏中行氏。韩魏早与范氏有矛盾，而范氏内部的范夷皋又企图取代范吉射为范氏宗主，智跖(智文子)则打算以嬖臣梁婴父

为卿，欲逐荀寅(中行寅)而代之。智跖便对晋定公说“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指范吉射、荀寅、赵鞅)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于是荀跖、韩不信(韩简子)、魏曼多以拥护晋定公的名义攻打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并不示弱，便联合反攻定公，由于国人支持定公，二氏失败，荀寅、范吉射皆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不久，赵鞅因韩魏向定公的请求，又返回了绛都(今侯马市西北)，盟于公宫。次年，赵鞅与智跖又盟誓结好。

斗争发展的结果是，赵、魏、韩、智四家战败了范氏、中行氏，共同操纵了晋国政权。“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接着赵、魏、韩又联合消灭了智氏，于进入战国时代(公元476年)后的公元前453年(晋哀公四年)三家分晋，结束了约有600年历史的晋国。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说：“赵鞅专地而结韩魏……三卿分晋之祸实始于此”。

赵鞅是赵国发展强盛时期的重要人物。作为异姓卿的赵氏在曲沃武公“尽杀群公子”、晋献公“尽逐群公子”后，亦即晋国宗室姬姓的群公子被杀被逐后，不断兼并其他诸卿实力，保存壮大自身。在继赵盾、赵武之后，赵鞅又铸刑鼎，改亩制，采取新地税和户税制，调节税率，又尊贤重士，实行按军功赏禄，特别是在铁之战时，颁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的政令，大大激发了国人等民众忠于赵氏、奋勇杀敌的斗志。在联络团结各种力量为己所用的过程中，赵鞅不断与同情者举行盟誓(如与诸大夫盟于公宫，又与智跖单独举盟)，增强

内部的凝聚力。而侯马盟书就是赵鞅主盟，与众多本族与异姓举行盟誓的确凿实物证据。

从盟书内容反映出盟誓成为赵孟壮大赵氏频繁使用的必要手段，从而使赵氏最终成为春秋末晋国实力最强的政治势力。这里不妨举侯马盟书中的一则盟辞为例，盟辞大意是说：

赵(人名)岂敢不赤胆忠心地事奉宗庙的祭祀；岂敢不全心全意遵从与赵鞅盟誓于定宫、平陆命令；岂敢改变忠诚信义，离心离德，使亲庙与祖庙失守而丧失权位；岂敢怀有异心，使敌人赵稷等及其子孙复归于晋国，以及私下群聚结盟；请吾君与神明监察之，有违此盟，便殄灭其氏族。(参见附图一)

可以看出，这个名赵的赵鞅之党，是以其全族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在盟誓中向主君和神明保证效忠于赵鞅的。从侯马盟书全部资料先后次序中反映出，献身于新主君赵鞅的(即所谓“自质于君所”)参盟者多达152人，而被诛讨的敌人除5氏7家外，又增至包括先氏等4氏14家，多达9氏21家，可见矛盾冲突由赵氏内部扩大到内外交叉的更大范围。从史籍中可以印证，当时齐侯、卫侯以及周天子等均牵涉卷入其中，可见社会影响何等广泛。

摹本

韓不伐下夏也。亡其不伐不盡也。韓立國
 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
 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
 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
 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
 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
 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
 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
 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

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
 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
 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
 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
 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
 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
 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
 命不伐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
 不盡也。韓立國自平時立命不伐不盡也。

釋文

趙敢不聞其腹心以事其宗而敢不盡從嘉之明
 定宮平時之命而敢或鼓改助及內卑不守二宮者而
 敢又志復趙尼及其孫。魏之孫。魏直及其孫。趙

魏之孫。史醜及其孫。于晉邦之地者及群虐明者慮
 君其明亟規之厥秦非是

附圖一：盟書文例之一及釋文摹文

四、张颌先生的盟书研究

对侯马盟书文本内容的认识和了解,全赖于对其文字的正确识读及内容的史学考证。侯马盟书出土面世后,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震动,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如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朱德熙、张颌、李学勤、裘锡圭、高明、李裕民、黄盛璋及日本学者江村治树、平势隆郎等均发表了研究文章,可谓争论纷然、各有说辞。通过反复辩难,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愈辨愈明,见解渐归一致,其中以张颌先生的考证贡献尤多。张颌先生的考证文章,具有将考古学、历史学与古文字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特色,故而得出了真确结论。他最早于《文物》1966年第2期上发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接着与同志合作编著《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书中收入《侯马盟书类例释注》《侯马盟书丛考》《侯马盟书人名表》《侯马盟书摹本》等系列文章,又于1979年《古文字研究》第1辑发表《侯马盟书丛考续》系列文章,全面系统地考证理清了侯马盟书文字、内容与有关史实,揭示了盟书的史学内涵,为春秋史特别是晋国史研究增添了新鲜材料和新篇章,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郭沫若先生赞许:“张颌同志和其他同志们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

这里主要对张颌先生成果逐一概要介绍,以便一般读者了解,有进一步研究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张颌先生的原文。

(一)张颌先生不仅是1965年侯马盟书遗址考古发掘